

· 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系列 ·

中国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研究文集

(中)

金大陆 金光耀·主编

热烈欢迎新战友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系列 ·

中国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研究文集

(中)

金大陆 金光耀·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目 录

序言	沈国明	1
----------	-----	---

一九八〇年代

反思·回归·奋斗——近年知青题材小说漫评	费振刚 方克强	3
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张 化	17
不相信的和不愿意相信的——关于三位“寻根”派作家的创作	王晓明	28
农村文化对知青作家群体的影响	应光耀	45

一九九〇年代

试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柳建辉	57
在两种文明间振荡——“文革”中上山下乡女知青问题初探	金一虹	65
毛泽东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张 化	74
青春梦寻——读《北大荒风云录》	金大陆	85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及其历史命运	杜鸿林	95
知青洪流中的六九届中学生	黄洪基	100
“血统论”重压下的下乡知青	刘小萌	107
安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述评	刘小平	121
“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述论	关海庭	135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病退”、“困退”问题	史卫民	144
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分期	方 奕	150
也谈中国知青史的历史分期	柳建辉	156
下乡知识青年婚姻剖析	刘小萌	164
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朱学勤	188
红卫兵集团向知青集团的历史性过渡	杨 健	193

2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

历史勾勒：内蒙古与东北的知青文艺·····	杨 健	204
巴蜀女知青·····	缪珍南	209
周恩来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刘文杰	220
回乡知青的处境·····	定宜庄	231
上海知识青年支援新疆建设的历史回顾·····	姚 勇	241

二〇〇〇年代

试论“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几度起伏的经济因素·····	张 曙	253
知青运动与毛泽东的“三农”思想·····	郑以灵	258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何言宏	266
乌托邦里的哀歌——“文革”期间知青歌曲的研究·····	戴嘉枋	275
湖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	刘布光	305
李庆霖上书毛泽东与知青政策调整·····	蔡天新	313
邓小平与知青问题的解决·····	张 曙	323
女知青与农民婚姻的历史考察·····	李巧宁	332
“文革”时期知青小说的话语逻辑——兼论“文革”前后知青文学的精神渊源·····	刘起林	339
知青原生态诗歌的人性本原追求·····	何 青	351
20 世纪 60 年代初湖南知青上山下乡评述·····	朱钟颐	359
上山下乡与知识青年——为《知青部落：黄山脚下的 1 万个上海人》所作的序·····	姜义华	368
“文革”时期的知青美术·····	王明贤 严善鐔	375
论“白洋淀诗群”的文化特征·····	李润霞	388
上山下乡运动再评价·····	[法] 潘鸣啸	399
《魂系大巴山：重庆(1964—1965)老知青回忆录》前言·····	[美] 邓 鹏	424
日常仪式化行为：以知青为例的研究·····	吴艳红 [美] J. David Knottnerus	430
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	王汉生 刘亚秋	447
从辉煌走向低谷的知青文学路在何方？·····	刘晓航	469
论中国大地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叶 辛	480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户口迁移问题研究	赵文远 500
记忆上山下乡——论知青回忆录的分类、贡献及其他	梁丽芳 509
知青苦难与乡村城市间关系研究	刘亚秋 520
“文革”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发展过程研究	陈 通 544
知青美术源流述略	王洪义 558
“我们曾经的青春岁月——知青下乡 4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任 毅 578
知青后代记忆中的“上山下乡”——代际互动过程中的传递与建构	杨晓明 584
知青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和叙事视角的时代性变迁	黄 婧 597

会 议 文 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社会心理探析——以福建知识 青年为例	叶 青 613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综述	邱新睦 621
上山下乡人员迁移的分类研究——以福建为例	陈 静 638
“上山下乡运动”的社会心理动因与历史必然性辨析	陆亚平 660
知青文学和上山下乡运动	郑祥安 676
知青问题研究应当处理好六个基本关系	阮显忠 688
管窥“知青运动”中的社会互动	徐春夏 692
云南知青大返城风潮解析	周公正 700
论知青文学在改革开放文学创作中的关注原因及其重要位置	孙琴安 709
知青与 1969 年黑龙江八岔岛事件	刘 琪 714
“知青学”呼之欲出——对知青问题研究的一个思考	朱政惠 729
知青一代的终结——从知青文学到知青后文学	郭小东 734
经济问题不是上山下乡的主要动因	[法] 潘鸣啸 (Michel Bonnin) 754
关于上山下乡运动中知识青年概念的界定	黄洪基 758

附 录

顾洪章就“2008 知青学术研讨会”给楼曙光的信	顾洪章 763
--------------------------------	---------

4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

一次还原和澄清历史的有益探索——“2008 知青学术研讨会”综述

..... 承红磊 陆亚平 楼曙光 766

抒情年代——“我和知青文学”座谈会纪要 方国平整理 780

新时期知青文化资源初探——以上海地区为例 朱盛镭 786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参考书目选录

..... 上海知青网提供 楼曙光 林升宝等整理 798

海内外知青网站举要 上海知青网整理 809

若干年份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状况统计 814

走向学术：中国知青运动的延展和赓续（代后记） 金大陆 金光耀 821

鸣谢 《文集》编委会 825

二〇〇〇年代

试论“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几度起伏的经济因素

张 曙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主要是试图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问题,并把它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开发边疆和偏远山区的事业结合起来,从而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就业途径。在“文革”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知青上山下乡演变成一场狂热的政治运动,并在诸多因素作用下,呈现出大起大落的特点。本文拟从经济角度,探讨“文革”时期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大起大落的原因。

(一) 1968、1969 年运动出现高潮的经济因素

“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始于 1967 年 10 月,以曲折等人到内蒙古牧区插队为标志。从这时起到 1968 年 4 月,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自发阶段。1968 年 4 月 4 日,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厂、面向基层)的分配原则后,自发的知青上山下乡开始与国家有目的地宣传组织结合起来。1968 年,全国上山下乡的城镇知青达 199.68 万人。1968 年 12 月 12 日,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发表后,上山下乡运动的浪潮被迅速推向顶峰。仅 1969 年 1、2 月间,就有 155.6 万人下乡落户。1969 年,上山下乡的城镇知青达 267 万。1968 年、1969 年是上山下乡运动的“黄金时代”,是上山下乡运动的第一个高潮。

1968、1969 年上山下乡运动出现高潮的经济因素是:1967 年和 1968 年,“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发展,全国出现“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政治局面,经过 1962 年至 1965 年三年调整后恢复和发展的国民经济,因受到社会动乱的严重破坏而急剧恶化。原定的 1967 年国民经济计划无法执行,实际上被废置。1968 年

张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

连年度计划都未能制定。由此造成这两年的生产大幅度下降,1967年工业总产值下降13.8%,财政出现赤字;1968年工业总产值又比上年下降5%,粮食比上年减少175亿斤,财政收入进一步减少。许多企业停产、停工,绝大多数工矿和企业无法收新工人。加之1967年,林彪、江青集团大刮生产资料所有制“升级”的歪风,因而城镇的集体经济大大萎缩,个体经济基本上被消灭。城镇新成长劳动力的就业渠道就只剩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比以往几个时期更加狭窄,大大加重了城镇就业的困难。同时,招生考试制度又被废除,堵住了中学毕业生直接升入大专院校的门路,造成老三届学生大量积压在城镇。就业问题成为困扰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四个面向”中,所谓的面向边疆,主要是面向边疆的农村;面向基层,主要是面向农村的基层,即参加农业生产。上山下乡于是就成了城镇知识青年就业的主要方向。

(二) 1970—1972年运动大滑坡的经济因素

1970年至1972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出现大滑坡。1970年,全国共有106.4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相当于1969年的39.8%;1971年减至74.8万人,相当于1969年的28%;1972年再减至67.4万人,相当于1969年的25.1%。上山下乡运动的第一个高潮至此跌落谷底。

造成1970年至1972年上山下乡运动大滑坡的经济因素是:由于国内政治局势逐步趋于相对稳定,1969年的国民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3.8%。1970年的经济发展较快,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5.7%,国民经济的其他主要指标增长的幅度也比较大。但由于对国际形势可能导致外敌入侵的战争危险估计过于严重,对国内刚见好转的经济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因而突出强调要“以战备为纲”,集中力量建设战略后方,建立自成体系的经济协作区,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在这种“左”的指导思想下,同年12月政府提出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中,又出现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的问题,并按高指标确定招工人数。因而在建设中出现了建设规模过大,积累率过高;职工人数急剧增多等问题。加上一些单位为了安排本单位的职工子女,采取“内招”办法,任意增加招工人数,致使企业单位增加职工人数超过企业实际需要。1971年国民经济经过努力,工农业总产值完成了计划的104%,比上一年增长12%。但由于不顾存在的矛盾,盲目地继续追求“四五”计划纲要中规定的高指标,因而经济建设的冒进之风有增无减。1970年和1971年,原计划全民所有制

单位职工增加 306 万人,实际增加了 983 万人,超过计划 2 倍多,到 1971 年冬,职工总数达到 5 318 万人。工资总额和粮食销量控制不住,使 1971 年出现了“三个突破”:职工人数突破了 5 000 万人,工资支出突破了 300 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 800 亿斤。

由于经济过热,导致城市招工人数逐年增加,招工对象包括退伍军人、经过劳动锻炼两年以上的部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及家居城镇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由此造成毕业的初、高中毕业生和历届未下乡的毕业生,又大都在城镇就业。许多城镇青年等待招工,于是下乡人数逐年减少。

(三) 1974—1977 年出现上山下乡第二次高潮的经济因素

70 年代初经济冒进造成的危害到 1973 年下半年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国民经济各项主要指标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任务。下乡人数也略有回升,这一年共动员了 89.6 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74 年至 1977 年再次出现高潮,全国有 769.05 万城镇青年上山下乡,平均每年 192.27 万人。其中,1974 年为 172.48 万,1975 年为 236 万,1976 年为 188 万人,1977 年为 171.6 万人。

导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出现第二次高潮的经济因素是:“三个突破”问题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1972 年 2 月 5 日,周恩来总理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全国计划会议情况时指示:现在企业乱,要整顿,目前有些自流现象。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最突出问题是基本建设战线规模过大,导致了去年“三个突破”。原来的人不用,插队去了,又要招新的,职工增加太多,非犯错误不可。“三个突破”给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带来一系列问题,应注意解决。^①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务院从 1972 年起,特别是 1973 年,采取各种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一是大力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二是精减职工人数,严格控制新增职工,大力加强对劳动工资的管理;三是整顿粮食统销工作,改变粮食销售大于征购基数的倒挂局面等。1972 年 4 月 7 日,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严格控制职工、充分挖掘现有劳动力潜力的通知》。根据“三个突破”的情况,要求严格控制增加职工。新增加的职工,一般不要从农村招收。矿山井下、森林采伐和地质勘探招工时,可以招收本单位子女。但是,各地对控制措施执行不力,到年末,实际增加职工 292 万人,

^① 何光主编:《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37、438 页。

另外集体所有制职工增加 155 万人。针对这种情况,1973 年 2 月 21 日,李先念副总理在全国计划会议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第一条,1973 年基本不招工,除了特别批准的以外,一个劳动指标也不给。1974 年也基本不招,甚至 1975 年也基本不招。需要安排的大专毕业生和家住城市的复员退伍军人,从减少的人数中安排;新开工企业需要的职工从现有职工中调剂解决。第二条,能减的坚决减下来。第三条,基本建设项目要统一调度。3 月 12 日,他在全国计划会议劳动力问题座谈会上讲话,再次要求各地要做进行减人的充分工作。^① 1973 年 1 月 7 日至 3 月底,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根据周恩来和李先念的指示,确定 1973 年和 1974 年基本不招工。并要把超计划自行招收和突击招工的都要减下来。此后,各地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实际减下来的并不多。尽管如此,毕竟起到了一些抑制增人、刹住增人风的作用。1973 年 6 月 22 日至 8 月 8 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讨论统筹解决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并制定具体实施办法。8 月 4 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同时印发《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明确规定城镇中学毕业生的分配,以上山下乡为主。于是,又引发了新一轮的上山下乡高潮。

1976 年后,一方面是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同时又由于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政治生活的巨大变化,以及知青大规模“返城风”和各方面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抵制等因素,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人数逐年减少。1978 年为 48 万人,1979 年为 24 万人,1980 年为 15 万人。1981 年,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基本结束。

(四) 几点认识

从以上的论述中,似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 “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之所以呈现潮起潮落的现象,是与该时期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大上天下密不可分的,二者呈现某种程度的对应。不过该时期经济发展速度的高峰与低谷同动员上山下乡的高峰与低谷,正好呈反向运行。

2.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出现的潮起潮落,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大起大落,并不总是对应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文革”中呈现的是“上一下一上”的

^① 何光主编:《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37、438 页。

“之”字形;而在十年内乱期间,经济发展经历了“三起三落”。(第一次是1966年上半年经济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由于1967、1968连续两年的大破坏而急转直下。第二次是1969年至1973年经济刚刚恢复、发展,1974年又由于“四人帮”的破坏而重遭破坏。第三次是1975年经过整顿后,国民经济有了新的起色,由于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而受到摧残。^①)1975年由于在邓小平主持下在各个领域进行了全面整顿,因而国民经济在摆脱了停滞倒退局面之后又走向恢复和发展。但同时,1975年又是“四五”期间下乡人数最多的一年,这一年,城镇共动员236万知青下乡。这说明:经济状况只是影响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起伏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

3.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之所以呈现潮起潮落的现象,除了经济因素外,还有政治因素如毛泽东的推动等。与此相联系的还有教育体制的改革等因素。这已不在本文论述的范围,将另文再述。

(原载《世纪桥》2001年第1期)

^① 柳随年、吴群敢主编:《“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国民经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7页。

知青运动与毛泽东的“三农”思想

郑以灵

在 20 世纪的中国,“知青”是一个有独创性的新概念,它的全部内涵影响了一代人的思想行为和命运。知青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认为,知青上山下乡是培养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缩小三大差别的一项战略措施。西方学者在谈及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时却认为,在第三世界国家面临城市失业人口剧增、农村贫困长期得不到解决;并且大量的农村人口向着城市盲目流动造成种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这一实验和它一度取得的成效具有世界意义。而作为这场运动当事人的知青本人,当时过境迁人至中年时,对这一页青春颠沛史作超越时空的反顾,发出了“蹉跎岁月”和“青春无悔”两种声音。本文无意对知青运动作政治评判,因为它涉及面太广,与国民经济、农业问题、教育制度和毛泽东晚年思想都有密切的关系。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知青运动归根结底是社会就业问题,它与毛泽东的农村、农民、农业“三农”思想密切相关。

一、农村:“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十年“文革”的组成部分,但是作为知青上山下乡活动早在 50 年代初就开始提倡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大批农村未能升学的高小毕业生就面临着失学的精神痛苦和就业的实际困难,他们成批地、自发地涌入城市谋求出路,使已经被就业压力和粮食紧缺问题压得喘不过气的城市更加难以承受。国家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是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盲目涌入,减轻城市粮食供应以及就业等各方面的压力。对于不能升学的农村中小学毕业生,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劝阻他们不要盲目流入城市,动员他们在家乡从事农业生产。面对青少年未能充分就业的难题,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农村成为毛泽东解决问题的首选。1955 年 12 月,毛泽东作了批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

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泽东的这段批语,具体针对的是当时农业合作社缺少有文化的人,要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需要大批有文化的青年到农村去参加合作化运动的情况。他期望有文化的青年与轻视体力劳动的传统观念决裂,到农村去提高农村的文化素质,改变农村人口整体素质差的状况,为缩小三大差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青春。

但是,按照传统观念,人们上学读书是为了脱离贫困的生存环境以谋取更好的人生出路。以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单就职业本身而言,它作为社会位置是存在高低贵贱的。因为它是社会地位的具体体现,不同的职业为从事该职业的个体提供了不同的物质待遇和精神报酬,这是一种客观存在。而当时的做法,把青年希望脱离农村和不愿去农村务农视为落后的传统观念,这是从意识形态上寻找突破口,避开了经济上的真正起因。

党中央和毛泽东为了推动这项本质上是解决就业问题的知青运动,树立了许多知青典型。由于职业角色也同其他角色一样,影响和指导角色行为的基础是职业的角色期望。知青到农村务农有怎样的美好前途必须有典型做榜样。1964年毛泽东七十一岁生日的时候,破例办了三桌便宴,被安排坐在他左右侧的就是知青先进典型邢燕子和董加耕。社会赞许对人的行为有着明显的影响,人们期望获得社会的赞扬和鼓励。宣传机器大肆渲染农村需要有文化的青年和农业劳动在社会中的崇高地位,以及毛泽东对于知青的嘉许,知青典型就在广大青年中产生了归化作用。在作为位置的职业和作为角色行为主体的职业角色扮演者两个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因为无论对社会的贡献还是个体价值的实现,都是通过个体的角色行为实现的。通过典型的宣传,加上“文革”前青年中普遍弥漫着强烈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下乡当农民光荣的观念日渐得到未能继续升学的中学生的认同。毛泽东曾说:“总而言之,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①1964年1月,中央书记处开会就决定,在今后十八年内要安排3500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插队当农民。

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广阔天地”去与农民相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人认为毛泽东的观点带有“民粹主义”的倾向,因为俄国民粹派认为平民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40页。

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是建立社会主义的保证。其实这是不合实际的。毛泽东对知青到农村去的提法,除了解决就业问题外,在政治上的考虑主要还是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缩小三大差别出发的。毛泽东关于青年问题有一段名言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①

上山下乡运动意味着特别重视农村的建设和发展,事实上也可以看作是以城市的人力和物力支援农村建设的一个实验。也有论者认为毛泽东提倡知识青年当农民,导致了对知识分子和城市的忽视,忽略了中国加速城市现代化的潜力和城市发展的战略地位。周恩来曾说:“青年到山区和农村去是毛主席的号召,其目的是要我们关注乡村建设,改变半殖民地经济所遗留的畸形发展状况,促进社会主义经济产生,以在更加平衡的发展中取得更大的成就。”^②今天,当我们回溯历史时,不能不看到毛泽东将青年的社会位置定于农村,确实有失偏颇。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指出,中国“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产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了严重的问题。”“耕地少,人口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③这说明了农村人多地少,已人满为患,将人口流向从城市导向农村,不符合青年对职业角色的期望,只有发展生产力才有可能解决就业问题。然而,就业问题是个社会问题,不是生产力发展了就可以迎刃而解。邓小平认为,“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而我们人口这样多,怎样两方面兼顾?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机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④“统筹兼顾”是个大课题,是执政中无法回避的。因此,毛泽东面向农村的就业方针及其实践,可以说是根据中国国情和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的一次社会实验,尽管它是一次不成功的实验。

二、农民:吸纳性最大的劳动群体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农民的状况如何决定着革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6页。

② [美]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③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

命的成败和国家的盛衰。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系统地探索了农民问题,科学地阐明了农民在中国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农民阶级的特点和发展前途,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领导农民运动十分娴熟。他清楚地知道,农民是最大的劳动群体,人员基数大,同时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的农业生产技术含量低,因此农民是一个吸纳性最强的劳动群体。当“文革”进入第三个年头的时候,由于废除了升学制度,城市里已经滞留了数百万的中学红卫兵,他们的就业出路在哪里呢?毛泽东于1968年12月22日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为中学毕业生的前途与就业安置做出了最终的裁决。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少数先进的前卫人士的行为,并且建立在动员和指导的基础上。但是,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为发端,此后的中学毕业生几乎全部(少数病残者外)被强制性地安置到农村当农民,然后以农村为“蓄水池”,根据城市发展的需要,再视情况进行少量分流安排进城工作。这种做法,完全抹杀了当事人的职业角色意识。毛泽东最高指示中的关键词是“再教育”。“再教育”的内涵十分丰富,其表层意思是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向贫下中农学习,把自己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其深层意思则向来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那就是拔高农民的政治地位,确立农民对知识青年居高临下的社会位置,对农民接纳外来人口进行精神补偿,从而促使农村同志“欢迎他们去”,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学生的就业出路问题。

在一个落后而封闭的社会环境里,其职业角色期望往往表现出松散、模糊和人格化倾向。知青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教育内容是模糊的,不过是一些“忆苦思甜”的家史和类似原始性的田间劳作;教育目的是使知青思想革命化,把自己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种极为松散模糊的职业角色期望带着人格化的倾向。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充分发挥了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再次赋予了农民以崇高的位置。美国学者迈斯纳认为,民主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又一次把农村作为进步和新生的基本源泉。‘先进的农民’而不是城市居民被当成完成对人的道德和思想进行改革的主要力量”。^①毛泽东

① [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和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0页。